作为一种正义的“耻”：J. M. 库切作品中的伦理未决

“Shame” as a Form of Justice: The Ethical Ambiguity in J. M. Coetzee’s Works

陈佳璐 (Chen Jialu)

内容摘要：精神危机是库切作品的重要主题。“耻”是他从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传统中生发出的一种变形后的罪感；是在神被祛魅的时代下，身处畸形法律和道德中个人面对不公而审判自身的动力与依据。库切试图祛除宗教视角，在世俗层面进行苦涩的伦理探索。整体的道德沉沦和沉默的身体共同催生出了“耻”，使库切不能轻易对苦难之后的道德和解进行文学想象。在精神危机和伦理解决上，库切延宕了人物的道德选择。从库切写作的历史背景和个人身份来看，伦理未决成为了一种文学正义。

关键词：“耻”；库切；伦理；文学正义

作者简介：陈佳璐，贵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南非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本文为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存在主义视域下的J.M.库切书写之‘耻’”【项目批号：贵大人基合字（2023）040号】的成果。

Title: “Shame” as a Form of Justice: The Ethical Ambiguity in J. M. Coetzee’s Works

Abstract: A spiritual crisis constitutes the central theme in J. M. Coetzee’s works. The concept of “shame” in Coetzee’s writings represents a transformation of guilt stemming from his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Shame” serves as both a motivation and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self-reflection when confronted with injustice within a distorted legal and moral framework, particularly in an era marked by the disenchantment of God. Coetzee endeavors to eliminate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and conducts a profound ethical inquiry on secular level. The whole moral decline, coupled with the silent body, engenders “shame” that renders Coetzee unable to envision moral reconciliation following suffering. Regarding spiritual crisis and ethical resolution, Coetzee defers the moral decision of the character. Drawing up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etzee’s writing and personal identity, ethical ambiguity emerges as a form of literary justice.

Keywords: “Shame”; Coetzee; ethics; literary justice

Author: Chen Jialu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15285068487@163.com).

在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经历了三种选择，即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人类文明始于自然选择。类人猿获得了人的形式。伦理选择形成了人的本质，科学选择旨在以技术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¹文学从起源上说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标志，它将伦理观念具化为文本，并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²伦理价值即是文学的基本价值。³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叙事展现了人求善逐恶的伦理观念，以及社会的伦理禁忌。J. M. 库切（J. M. Coetzee）正是一位频繁在小说中展现伦理困境，思考人物如何做出伦理选择的作家。他出身于南非，追求共情与平等的道德伦理，但对可能会压迫个体的思想保持警惕。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对自己故乡的审视与回归，再现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体系对人们造成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影响，试图探求修复人与人关系纽带的可能性，却对可能的“救赎”保持距离。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流散者，库切不断地思考自我在历史上的角色和责任，以及自我对于弱势他者的义务，因此伦理选择成为了他小说的重要内容。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对库切小说内容的伦理阐发，探究后殖民文学的伦理转向在其作品中的呈现。⁴但是，它们未揭示出库切小说具有的伦理未决性特征，及其在库切进行文学表达时的重要作用。库切并没有在堕落—救赎的框架下思考。在人物遭遇精神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伦理解决上，库切让人物的选择延宕，使伦理未决成为了一种文学正义。

一、库切之“耻”

读者可以从库切作品中发现他对于“耻”的重视。在《铁器时代》（*Age*

1 参见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6。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3.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13。

4 参见 史菊鸿：“从苏珊的‘实体’问题看库切的主体观”，《外国文学评论》4（2016）：215-228；金怀梅：“库切作品中的素食伦理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2020）：110-120；蒋晖：“‘耻’的哀悼：大屠杀叙事与后殖民写作的伦理转向——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说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1）：74-83；姜小卫：“沉默与言说：库切小说《福》与后殖民批判”，《外国语文》2（2016）38-45；王妮、向天渊：“库切小说中的‘属下’形象——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一种阐释”，《当代外国文学》3（2017）：149-156；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代外国文学》4（2010）：66-74。

of Iron, 1990) 和《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 中, 主人公频繁地以“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将其视作人在特定时代下重要的精神状态。1999年, 库切出版小说《耻》(Disgrace), 展现了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寻求伦理和解的困境。

分辨善恶的能力使人不同于动物, 这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进行的伦理选择。¹ 库切也是如此, 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压倒了兽性因子,² 南非白人身份使他生来就背负着“耻”。他既反对布尔人的种族隔离政策, 也难以将自己视为非白人群体的代言人。无论自己是否参与种族压迫, 是否认同布尔文化, 面对严密的国家机器, 身为南非白人就意味着带有共谋性地参与了种族隔离。因此, 库切的早期小说一直思考作为殖民者后代该如何面对身份带给他的“耻”。不过, 库切没有抛弃他的“耻”, 而是形成了另一种自我认识的路径。他要在写作中拥抱“耻”, 表达对自己出身的愤怒。同样, “耻”让他的存在变得延宕。库切在其小说里的隐现不是为了形塑全新的自己, 而是延续由“耻”所导致的存在焦虑。

库切的“耻”是从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文学传统中生发出变形后的罪感。法律是现代社会的权威标准之一。然而, 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 非人道的行为和种族主义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面对他者苦难、法律不公, 库切持守作家与生俱来的道德使命。他一方面关注他者的苦难, 另一方面也从自己不光彩地参与到种族隔离这一事实中深切体认到“耻”。罪感文化植根于基督教。“耻”则是在神被祛魅的时代下, 身处畸形的法律环境和道德环境中的个人面对不公而去审判自身的动力与依据。整体的道德沉沦和沉默的身体共同催生出了“耻”, 让库切不能轻易对苦难之后的道德和解进行文学想象。

由于关注种族他者在南非社会的遭遇, 库切的作家主体性也受到了他者面容的击打, 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作家身份的合理性。库切不把自己看作是预言者、真理言说者或社会导师, 不认为作家的权威性。反而, 他对自己的作家身份感到了“耻”, 即作家之“耻”。蒂莫西·贝维斯(Timothy Bewes)认为, 南非白人作家要对南非历史做出批判性的文学回应本身就是一种“耻”。在复杂的伦理境况中, 写作仅有在背叛那种复杂性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耻”对库切而言既是义务又应受谴责, 是不可能的, 又是不能够避免的。而南非白人在种族主义中的共谋又让作家的道德境况更具有自我审视的意味。所以, 库切的作品一直暗中为以下三个问题感到困扰: 在意识到写作与想要结束的事物有共谋性的前提下, 如何有良心地去写作? 如何在意味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6.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9.

到不公正的情况下写作，并且宣称写作与个人作为作家的职业能够免除于不公正？如何去辩解写作中隐藏的至高无上的专横性质。¹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书写的的能力就是库切为作家身份感到“耻”的原因。²

库切没能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伦理和解的方法，也未能从他者那里获取消除自身存在焦虑的能力。在对库切早期小说的评论中，多数认为他没能展示出各种历史力量斗争的清晰图景，或没有建立任何对于殖民主义或种族隔离的伦理导向。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批评库切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1983, 下文简称为《迈克尔·K》）中没有想象出一种解决方式。³但戈迪默持批评态度的原因是她拥有和库切不同的作家观。在2002年在国际作家组织PEN的讲座上，戈迪默说道：“因为我曾是一个作家（……）我成为了我的社会中未被发声的人的见证人”（qtd. in Bewes 140）。但这对库切是难以想象的。戈迪默的宣言在声称自己的写作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同时，也暗含了例外和开脱罪责的请求。她假定了人类意识中的伦理基础，将对认识的纠正和改善视作伦理计划，但库切更警惕作家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例外。库切的写作是对自我特权和共谋身份的一种“自我诊断”。⁴他严厉地质疑作家通过写作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合理性，拒绝把自己定位为旁观的见证人。但是，身为作家的他不可能对社会上的现象视若无睹。出于普遍的伦理责任感，库切选择以自己的立场去写作。⁵作家之“耻”正是在写作的先验命令和应受谴责的写作特权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

二、整体的道德沉沦：共谋之“耻”

库切关注人在特定境遇下的疑惑和行动上的停滞，正视苦难的残酷和人们在苦难形成中的共谋。⁶《等待野蛮人》呈现了不平等环境下的共谋问题。《等待野蛮人》从老长官对乔尔上校的抵触出发，讲述以乔尔上校为代表的帝国

1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7, 139, 150.

2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3 参见 Nadine Gordimer, “The Idea of Gardening,”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1420001763/GLS?u=sichuan&sid=GLS&xid=96ce1c54>, Accessed 6 Jan. 2025.

4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0-141.

5 库切认为作家有两种责任。一是社会、社会的灵魂、社会的希望和梦想强加给作家的一种义务。二是作者的本性，即良心。库切倾向于称第二种责任为一种命令，即先验的命令。参见 J. M. Coetzee,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avid Attwell,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40.

6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51-52.

征服心态和严刑拷打对老长官的精神打击，以此展现博爱在病态环境下的缺失。老长官作为帝国体系里的一员，在边陲小镇里过着清闲的日子。他对生活在荒野中的野蛮人是温和的，并不去征服他们。然而，这一切在乔尔上校到来后就改变了，他严刑拷打了被偶然逮捕的两个野蛮人。尽管他们并未参与野蛮人的抢劫活动，只是在附近求医看病。乔尔怀疑他们与最近野蛮人要集结起来攻打帝国的传闻有关，坚持要审问他们。没过多久，老人被拷打致死，男孩则受了重伤。老长官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惋惜，但乔尔对这样的审讯不以为然，他相信只有疼痛才能使真相浮出水面。

老长官经历了没有结局的伦理事件。在老人和小孩被拷打之后，老长官猛烈地觉察到自己间接参与其中的共谋性。当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惨剧时，他不自觉地为自己辩护：

后来人们声称从粮仓听到了尖叫声，但我什么也没听到。那天晚上的每一刻，当我开始我的工作时，我都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耳朵甚至会听到人类痛苦的音调。但是粮仓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门很重，窗户很小。它位于南区的屠宰场和磨坊之外。曾经是前哨，然后是边境的堡垒，现在变成了一个农业定居点，一个拥有三千人的城镇，生活的喧嚣，这些灵魂在温暖的夏夜发出的喧嚣，并不会因为某处有人在哭泣停止。（在某个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理由辩护。）（9）¹

但道德感依旧引导老长官去了解真相。他打着灯走进了谷仓，看到了被折磨后虚弱无力的男孩。他想到：“我感到我的心变沉重了。我从未希望被牵扯进这种事情。它将在何处停止，我不知道”（12-13）。自此，老长官的良知开始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上风。他照顾了一个看不见的瘸腿女孩。她的父亲死于拷打，流落街头时被老长官发现。后来，老长官亲自护送这个女孩回到了她的部落，但在回到小镇后却被判了通敌罪，被囚禁了起来。老长官的行为表露了他内心博爱意愿的生发。他听见了犯人拷打的叫喊声，这声音不仅击打了他的良知，也击打了他对自己的认知。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独立和自足的个体了。从自己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到想要盖住耳朵，好不听任何暴力的声响，他内心的自我防护罩已经被击溃，他不能再将自己隔绝在他人的苦难之外。²

库切让老长官去审视自己生活的共谋性，突破帝国 / 野蛮的二元对立。老

1 本文有关《等待野蛮人》的引文均来自 J. M. Coetze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2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M.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43.

长官对盲眼女孩的关照也已经超出了他所处的位置能够做到的极限。不过，老长官的转变停留在了伦理困惑的状态。他虽然对帝国有质疑和反思，但囿于帝国的认识体系，难以逃脱帝国历史施加于他的思想重负，更不可能摆脱他代表帝国的身份。而对盲眼女孩来说，作为帝国官员的老长官帮她洗脚实际上是令她感到恐惧的事件，是她所遭受的拷打的一种变形。后来，老长官也发现自己与乔尔并无本质差异。“我是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帝国在凛厉的风吹起时的真相”（181）。

在帝国偏执猜疑的思想形态中，老长官以法律为行事审判的标准。他却无奈地觉察到帝国的法律仅仅出于维护帝国的利益。当面对弱势者的“错误”时，法律就成为了欺压的工具。因此，老长官总会在他做出不公正的审判后良心不安，并感到羞耻。老长官是一个无力的主体。他处于帝国历史迷宫的中心，不会找到指引他取得根本性伦理转变的方向。尽管他冒着风险把盲眼女孩送回了部落，但他仍然属于帝国。他不能对自己陷入的困境以及这个自己共同参与其中的，针对野蛮人的阴谋发表权威的意见。由此也可看出老长官在面对他异性事物时理解力上的缺失。这部作品展现的不是已经获得的知识，而是想要去获得知识的意图；展现的不是理解的结果，而是理解的过程。到最后，老长官也没有得到任何对于一切确定的解释。¹在小说结尾，他失落地想到，“像现在的其他事情一样，我觉得很愚蠢，就像一个早已迷路的人却还要沿着一条无路可走的路走下去”（207）。

小镇的居民是被帝国的敌对意识所奴役的去主体性的群体。一开始，从帝国中心传来了关于野蛮人开始攻击的传闻。经过一些小事件的发酵后，帝国决定在战争开始之前采取防备性的措施。这种集体不安的情绪很快在普通人的身上变成了偏执的幻想：“没有一个住在边境的女人没有想过一个黑色皮肤的野蛮人从床底下抓住她的脚踝，没有一个男人没有想过野蛮人会在他的家里捣乱，打碎盘子，烧毁窗帘，强奸他的女儿而不受到惊吓”（14）。在乔尔抓捕了一些并不能被证明为要对帝国展开突袭的野蛮人之后，民众的狂欢达到了极点。他们在广场上喊叫着，争抢武器去殴打这个被塑造出来的敌人。在出发征讨野蛮人的部队迟迟未凯旋归来时，他们只能费力地讨好留守在城里的士兵。最后，部队放弃留守边境，这些居民只能收拾家当，结伴逃难而去。

居民们从未思考过野蛮人是否真的会攻击他们，未在受拷打的野蛮人身上看到与他们相同的人性。他们任由帝国控制自己，又莫名地憎恶野蛮人。他们的恐惧甚至让他们放弃了家园。《等待野蛮人》展现了整体的道德沉沦。帝

1 参见 Mike Marais,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Lawrence J. Trudeau, 41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1100123398/GLS?u=sichuan&sid=GLS&xid=0c213220>, Accessed 6 Jan. 2025.

国任意性¹的历史造就了大多数人的无知盲从。而小说中清醒的老长官限于帝国的思想体系却不能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他只能被裹挟在帝国的“摇篮”之中，等待不知何时会结束的历史。他发现，即使为野蛮人受到的拷打疾呼，自己也无计可施，依旧迷失在历史迷宫之中。

三、沉默的身体：超越之“耻”

除了整体的道德沉沦，库切在他的小说中还持续再现沉默的身体。这是一种不能也不愿在小说里超越苦难现实的写作旨意。库切看到了人性被暴政和强权损害扭曲，但囿于个人的局限性而对他人的苦难保持着距离。在写作中，身为作家的他主动取消了对他者的阐释权力，让他者处于不可接近的状态。所以，他的作品多体现出断裂和未完成的面貌，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仿佛迟迟不能达到某种澄澈和谐的宁静。库切没有在小说里展示超越，即使人物产生了某种类似的欲望，最后也不能实现。一方面，他在文学中书写恶与苦，毫无保留地袒露间接共谋者的“耻”；另一方面，他始终让和解的欲望悬置。他发现以往的创作中对于超越的追寻往往会和某些未能言明的企图勾连在一起，这些企图有时恰恰造成了文学中呈现的苦难。

作为苦难的旁观者，有忏悔意识的同谋者如何去面对被压迫群体？求助于形而上学暗含着视角的转移，潜藏着对苦难的轻视和消解。当写作主体有义务去表达立场却发现自身的空无和缺乏时，“耻”就会出现。在个体认知上，它是自我认识和自我经验不符造就的情感后果，是自我的中断和自我内部的他者性。²

“耻”不能也不应该被写作祛除。对库切来说，守住“耻”，悬置也许会到来的伦理和解是一种写作正义，这样就保存了处在历史瞬间里个人内心的真实状态，以及对他者生命的尊重。在美学上，对于库切来说“耻”是情境化的经历。当库切表示自己的作品对于苦难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抵抗时，意味着作家对于其艺术失败的表述。³这样一来，库切的作品就将自身维持在“耻”的不足形态中，以至于主体性缺失在文本中的表征就成为了静态的价值。⁴这是小说在面对自身美学与伦理张力时采用的补偿性手段。小说必须失败，必须丧失总体性和完整性，以换取伦理上的正当性。所以，库切小说里的绝对

1 小说中多处提到，野蛮人并不想与帝国交战，他们只想拥有安定的生活。帝国对野蛮人的偏执幻想则是基于某种任意性的评断，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库切凭此解构了大历史叙事的冠冕堂皇。它声称的必然性实际上只是任意性。

2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3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4 参见 Timothy Bewes,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

他者与人物浓重的困惑心理，不可和解与无法安慰的状态就成了库切必须去维持的风格。他的小说不在于从历史中得到心理上的疗愈，而是在历史面前保持不可和解，无法安慰的状态。¹

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切呈现绝对他者是试图定格流逝瞬间里的沉重躯体，并以疏离感来转喻他们受到的伤害。他的伦理学建立在承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无知，承认另一个人的他异性的基础上。²他作品中那些承受不公的弱势群体在不同的程度上均可视为极端的他者，他们不能被言语容纳，更拒绝被小说作者“翻译”。他（它）们身体上的残缺更凸显了苦难历史的物质性。例如，星期五若隐若现的被阉割的伤口和没有舌头的口腔；蛮族女孩瞎了的眼睛，走路时蹒跚的跛脚；迈克尔·K因饥饿和逃避官兵而异常消瘦的躯体；动物因疾病而肿胀的生殖器官等。库切没有以貌似更高更合理的观念去否定或转化这些痛苦，而是保留自我与他者的距离。他们的身体存在表明了一段无法哀悼、无法言说的历史，一段拒绝被翻译成文字或被语言召唤出来的物质历史。³库切对于沉默的坚持是他的写作伦理选择和抛弃作家权威的体现，是为了不对人物做任何随意或是强迫的处理，从而达到一种文学正义。

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立足于崩裂的社会，展现人们面对苦难和他者的局限。迈克尔在战乱年代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营地，以禁食和沉默拒绝接受改造营对他的医治。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库切加入了医疗官这个人物，并让后者对执意禁食的迈克尔产生兴趣，试图了解他禁食的原因。作为国家机器的一员，医疗官的持续关注反而增加了迈克尔的抵抗。医疗官对迈克尔的理解是误读，迈克尔成为了他眼里的“白痴”、“非人化的石头”和“能听见神意的人物”。⁴面对迈克尔的执拗，他带着救赎者的面具说着国家规训的话语，劝迈克尔不要再禁食，即使他知道自己并不能真正解救迈克尔。“事实是你会默默无闻地死去，被埋在赛马场角落一个无名的洞里（……）除了我，没人会记得你，除非你屈服，并最后张开你的嘴”（Coetzee, *Life & Times* 208）⁵。医疗官要求他逐渐增加胃口，获得充足的体力的医学劝告是为了让他回到政治话语对他的分类，从而进行体力劳动。当迈克尔宣称自己不在这场战争中时，他十分气恼地说：“这个营地是用来改造像你这样的人，并

1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24.

2 参见 Pieter Vermeulen, “Being True to Fact: Coetzee’s Prose of the World,” *J. M. Coetzee and Ethic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Anton Leist and Peter Sing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4.

3 参见 Sam Durrant,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26.

4 库切也通过一个细节暗示了医疗官对迈克尔的误解。他一直将后者称为“迈克尔斯”，这个错误的称呼直观地体现了二人的隔阂。

5 本文有关《迈克尔·K》的引文凡未特殊注明，均出自笔者拙译。

让你工作的！你要学会填沙袋和挖坑，我的朋友，直到你的背折弯！如果你不配合，你就会去一个比这里更糟糕的地方！”（Coetzee, *Life & Times* 189）在此处，医疗官的话语和国家话语重叠，二者本质上都在功利性地对待迈克尔这样弱势和边缘化的人，肆意“改写”他们的意志。因此，在迈克尔的顽抗面前，医疗官带有愤怒的语气说道：“我们都翻过边沿掉进了历史的大锅里；只有你，追随你的白痴之光，在一个孤儿院里等待着你的时代（谁会把那儿看成一个藏身之地？）〔……〕”（Coetzee, *Life & Times*, 207）；“他像一块石头，一块鹅卵石，从时间伊始就安静地躺在地上，想着自己的事〔……〕对它周围几乎一无所知，包裹在自己和自己的内部生活之中〔……〕”（Coetzee, *Life & Times* 185）。这些话语显示出医疗官站在了压迫者的一方，他不把迈克尔看作是实在的人，而是给当局的群体归类造成麻烦的“白痴”。

当发现自己被战争变成了“囚犯”时，医疗官又将迈克尔当作追随神意的不凡之人，开始向往迈克尔的野外生活。他幻想自己追随迈克尔的脚步离开营地，并对他说：“你不仅是另一个病人，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另一个伤者，不仅是这个由牺牲铸成的金字塔上的另一块砖〔……〕迈克尔斯，但是你是一个伟大的逃跑艺术家，伟大的逃跑者中的一员：我向你脱帽致敬！”（Coetzee, *Life & Times* 228）但直到最后，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对迈克尔有充分到位的认识，仍然在心里不断呼唤迈克尔回答他的疑问。医疗官对迈克尔的矮化和神化均忽视了迈克尔本人。无论是“石头”“白痴”，抑或是“能与神沟通的人”，医疗官的阐释是超越对象本身的误读。在他受局限的视野和知识体系中，医疗官没能意识到迈克尔这样的人会产生的批判意义。迈克尔通过破坏性的沉默展现出伦理责任和政治意图之间的矛盾。他不能被轻易地归入某些简单的叙述里，不能被简化。医疗官和他的互动显示了伦理怎样超越政治，同时避免被简单的判断、理解和并入到政治估算的过程。¹

这部小说想要表达的是，面对坚硬的身体和切实的存在，国家政治的话语、宗教的话语和医学话语都不能把实在的对象笼络到固定的范围内，因为任何狭窄的视角和话语都会将受难的事实切割、简化，最后消解/升华为不同的事物。库切通过绝对对他者和受难身体的展现，强调历史事件的物质性。这种对当下和身体的“粘滞”是他小说中“耻”的呈现。他拒绝用超越性的理念来驱散眼前的苦难景象，而是用集体性共谋，以及始终面向个体的写作信念指引自己，从而形成了他小说中浓烈的“耻”之氛围。小说中伦理和解的无尽推延实际上是他自身一直面临的伦理难题，而该问题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去主体主义的哲学思潮和具体历史事件的笼罩下又获得了一种代表性。库切的小说是对“历史的身体”的接入，不仅仅是国家史和民族史、也是微观

1 参见 Duncan McColl Chesney, “Toward an ethics of silence: Michael K,” *Criticism* 3 (200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A330005662/GLS?u=sichuan&sid=GLS&xid=d68c6ad7>, Accessed 6 Jan. 2025.

的、有血有肉、被损害与被忽视的个人史。虽然库切否定自己作为白人作家去为受难他者代言的合法性，也不在小说里构建某种最终的真理和完全的个人解放；但是他从自己的历史位置出发，通过文学想象担负起了历史再现的艰难事业，让“小说的失败”和伦理未决成为了一种文学正义，用悬置的伦理选择展示了人对于道德和善恶是非的坚守。

Works Cited

- Bewes, Timothy. *The Event of Postcolonial Sham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1.
-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avid Attwell. Boston: Harvard UP, 1992.
- .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83.
- .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
- Chesney, Duncan McColl. “Toward an ethics of silence: Michael K.” *Criticism* 3 (200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A330005662/GLS?u=sichuan&sid=GLS&xid=d68c6ad7>. Accessed 6 Jan. 2025.
- Durrant, Sam. *Postcolonial Narrative and the Work of Mourning: J. M. Coetzee, Wilson Harris, and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4.
- Gordimer, Nadine. “The Idea of Garden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Daniel G. Marowski and Jean C. Stine, 33 (1985).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1420001763/GLS?u=sichuan&sid=GLS&xid=96ce1c54>. Accessed 6 Jan. 2025.
- 金怀梅：“库切作品中的素食伦理意蕴”，《外国文学研究》2（2020）：110-120。
- [Jin Huaimei. “The Implications of Vegetarian Ethics in J. M. Coetzee’s Work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0): 110-120.]
- 蒋晖：“‘耻’的哀悼：大屠杀叙事与后殖民写作的伦理转向——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说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1）：74-83。
- [Jiang Hui. “Narratives of Holocaust and Ethical Turn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021): 74-83.]
- 姜小卫：“沉默与言说：库切小说《福》与后殖民批判”，《外国语文》2（2016）：38-45。
- [Jiang Xiaowei. “Silence and Speech: Coetzee’s *Fo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ostcolonial.”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2016): 38-45.]
- Marais, Mike.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1980).”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Lawrence J. Trudeau, 414 (2017). Available at: <https://link.gale.com/apps/doc/H1100123398/GLS?u=sichuan&sid=GLS&xid=0c213220>. Accessed 6 Jan. 202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5-25。

[Nie Zhenzha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Choi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5-25.]

——：“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8-13。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史菊鸿：“从苏珊的‘实体’问题看库切的主体观”，《外国文学评论》4（2016）：215-228。

[Shi Juhong. “J. M. Coetzee’s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n Susan’s ‘Entity’ Problem.”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6): 215-228.]

Vermeulen, Pieter. “Being True to Fact: Coetzee’s Prose of the World.” *J. M. Coetzee and Ethic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Anton Leist and Peter Singer.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0. 269-289.

王妮、向天渊：“库切小说中的‘属下’形象——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一种阐释”，《当代外国文学》3（2017）：149-156。

[Wang Ni and Xiang Tianyuan. “The Image of the Subaltern in Coetzee’s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7): 149-156.]

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代外国文学》4（2010）：66-74。

[Zhang Deming. “The Dilemma of 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Fo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0): 66-74.]